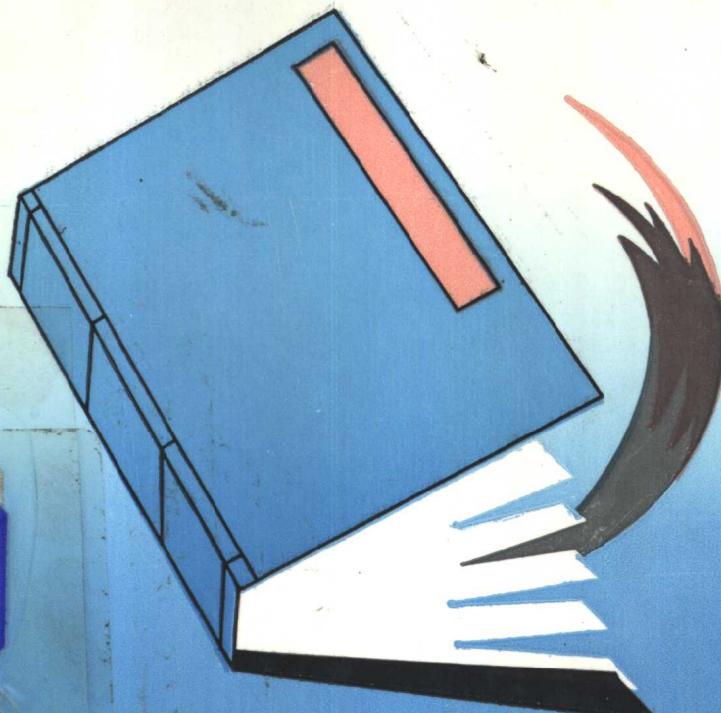


□ 贲 炜

书的知识

shude zhishi



G2
57

□ 贲 煜

书的知识

BC126/085

湖南文艺出版社

书 的 知 识

责 炜 著

责任编辑：骆正南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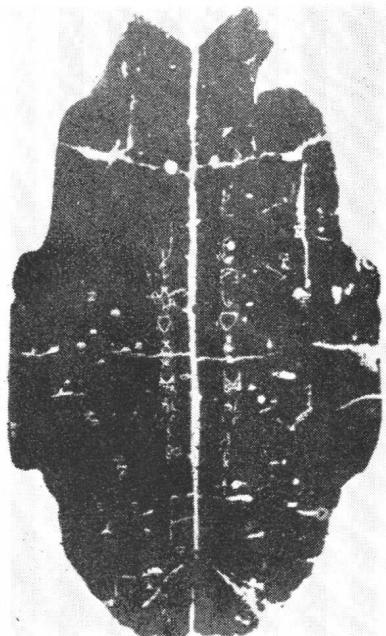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5

字数：238,000 印数：1—10,000

ISBN7—5404—067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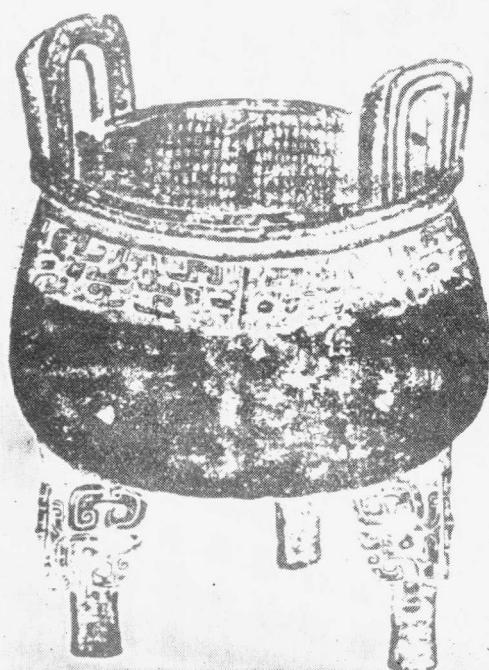
G·26 定价：5.00 元

殷代甲骨文（龟板）



殷代甲骨文（兽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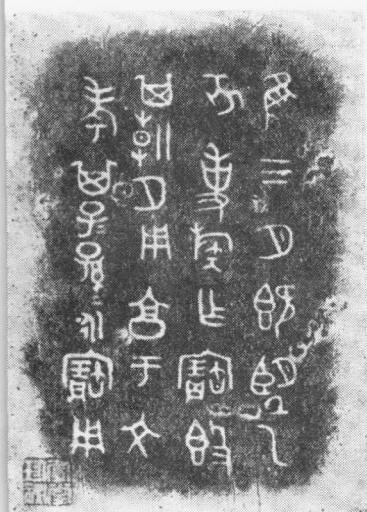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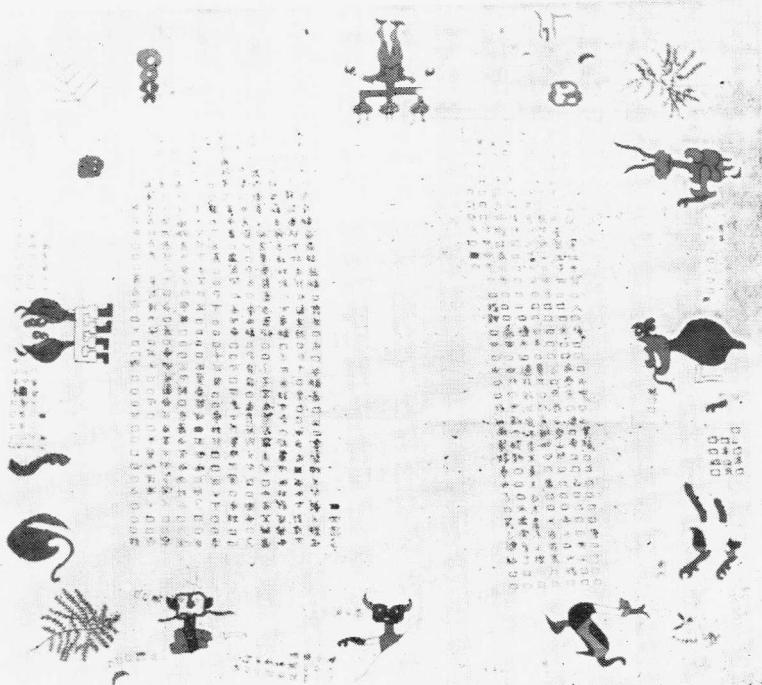
西周钟鼎文

下左：西周铭文

下右：竹简医书（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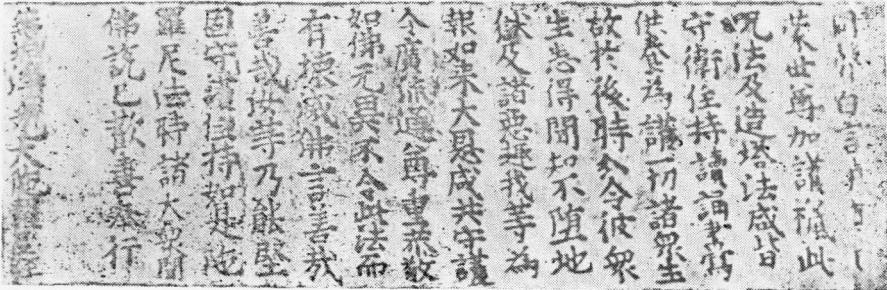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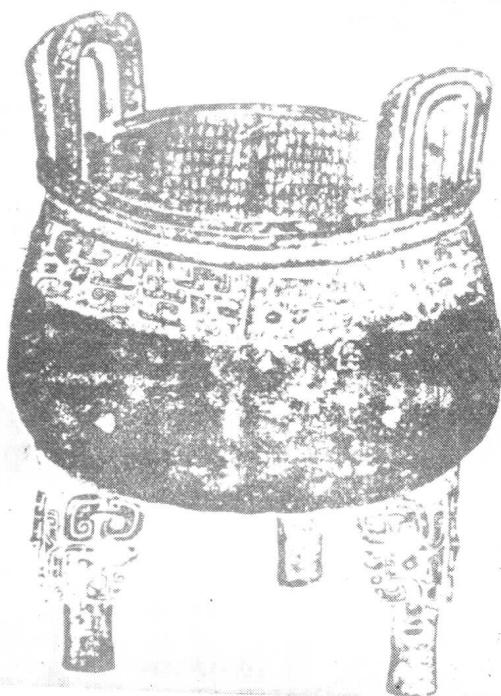
越吉尊乃王饗。樂謂王口弋曰。
王土工酒。則乃極。琨璫而服。雪及
之長平老。歲乃終。陽以至。歲始。陽
陽。患陰。醫。一引。謂。含。實。灌。斗。胃。瘡。
夫。身。本。霧。因。翻。食。井。八。陳。竟。井。食。
諱。六。多。而。醫。其。證。云。皮。甚。多。



世界最早的帛书（长沙战国楚墓出土）

世界最早的刻印书《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八世纪初。南朝鲜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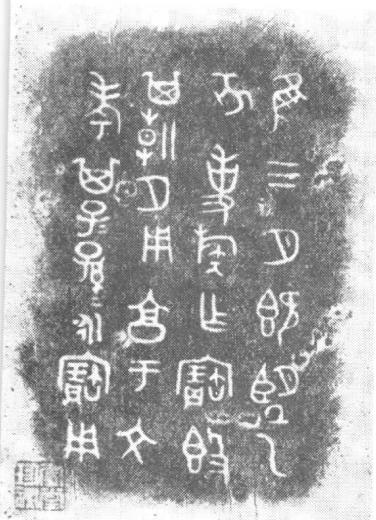




西周钟鼎文

下左：西周铭文

下右：竹简医书（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



西周钟鼎文
上土之尊于王饗多賈三日之日
不長不老賦多徐閭之王或其陽
陰費既鹽之以觀食實酒斗胃復
其事在夏禹之制食井八陳食井
詩六言而匿其鑒云良甚

目 录

前 言	(1)
一、书的源流	(1)
图书的产生与演变.....	(1)
古代的书案与书灾.....	(15)
古籍的鉴别与修补.....	(61)
二、书的结构	(68)
古代书的结构.....	(68)
现代书的结构.....	(71)
图书的编号结构.....	(74)
三、书的编辑	(92)
封面要求.....	(92)
书稿处理.....	(96)
图书影印.....	(125)
字体及其他.....	(126)
四、书的印制	(135)
排、印、装工艺.....	(135)
开本与纸张.....	(147)
五、书的分类	(164)
古籍的分类与版本.....	(164)
现代书的分类.....	(175)

六、书的使用	(184)
古籍阅读	(184)
工具书使用	(193)
名著举要	(224)
七、书的版权	(244)
图书稿酬	(244)
版权与版权保护	(246)
八、书的版权贸易	(293)
合作出版	(293)
版权转让	(299)
后记	(302)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303)

一、书的源流

文字是书的细胞，没有文字也就没有图书。文字的发生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没有文字的时代，在社会发展史上称为“史前时期”。这个时期大体上相当于原始公社制阶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越来越复杂，人们就愈迫切需要新的方法进行积累和传播。

远古时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想了很多办法，有的把它编成较容易记忆的故事、格言、顺口溜等，再一人一人地传开去，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关于远古时期的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等的传说，就是靠这样的方法传下来的。

同时，人们还创造了许多别的记忆的办法，如结绳记事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加强记忆，人们就在一根绳子上面结下大小不同，多少不等，以及涂上不同颜色的结子。人们见了这些结子，便唤起记忆，回忆出其中的含意。

刻木也是当初很流行的一种记忆方法，“刻木”古书上记载为“契刻”。人们在木板上刻出不同形式的符号，每种各代表一种意思，刻口大的、深的代表大事，小的、浅的为小事。

图书的产生与演变

结绳和刻木，只能记事不能达意，因为它只是一件件事情的

记号，不是人类语言的符号，所以它不能直接表达和传播，一定要在记忆的基础上靠语言进行表达。结绳和刻木只是简单的记号，不是有固定含意的文字。文字是在图画的形态上发展起来的，但它比结绳和刻木又进了一步，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已进入了表达某种意思的范畴。比如画个“鸟”的形状，就可以理解为“鸟飞了”、“鸟肉可食”、“鸟很美丽”等等。远古时代的绘画常常出现在人们居住的洞穴的石壁上，或在进行生产活动的现场画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物和事。如在我国的周口店，山顶洞人就画有这类绘画，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地的深山古洞中也留有旧石器时代的绘画。这些表达意思的绘画有着长期的演变过程。原来的精细逼真的形象在人们逐步熟悉了以后，便慢慢变成线条式的轮廓。轮廓又逐步变成象形符号。人们也就以这符号来称呼它代表的动物和事物。这样，图画就逐渐和人们的语言相结合而成为交流思想，加强联系的工具和手段。这就形成了最原始的文字。这种图形文字的组合就形成了较为复杂的语言。

这种从绘画变成文字的时代，大约在六、七千年前。在出土的原始氏族社会的陶器上就刻有语言符号，这种语言符号，就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到了四、五千年前的原始公社制晚期的殷商时期，我国已出现了记录性文字。

这个时期的文字，都是用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称为甲骨文。因为这些甲骨是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殷朝时的都城旧址上发现的，故也称殷墟文字。这种文字大多是象形文字，没有一定的固定的笔画，也就是说，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还属于人们自由发挥的阶段，还在不断完善中。可以断定，文字的演变过程远比我们目前所知的长得多。

这些象形文字大多是记载问病、除灾，鬼神作怪的迷信事和占卜的方法等。

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人们便在青铜器上刻字或铸字，也有

的在工具或武器上刻上或者铸上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它的归属。这些文字统称“金文”，又因为大多是刻在钟或鼎上，所以又称为“钟鼎文”。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有好几种字体，最早的是接近甲骨文，秦汉以后是小篆和隶书。这些记载的内容，与甲骨文已经有所不同，大多是伴随着进入奴隶制社会，私有制财产的出现，刻铸奴隶主贵族的名字，以表示这件东西归属的。后来又发展到刻铸上铸造的原因、用途和时间、地点等，而成为纪念性的文字。到了春秋时期，有的还把法律铸在鼎上，周知四方。这些文字，称为“铭文”。

在石头上刻字。我国现存的最早石刻，是秦国的石鼓。到了春秋时代，刻石已经很流行，到了汉代更为盛行，刻在山岩上的，叫摩崖，刻在长方巨石上的叫做碑，刻在圆石头上的叫做碣。这些刻文大多是纪念性的。

在石头上刻完整的著作，而成为“石书”，大概最早的要属东汉灵帝时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完成的《石经》。《石经》是指在石头上刻就的儒家经典。

东汉灵帝令书法家刻在石头上的石书还有：著名的《书》、《诗》、《易》、《仪礼》和《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这种石书主要是为了便于传抄者校正文字，免得产生错误。

到了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又出现了《三体石经》。所谓《三体石经》，就是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就的《尚书》和《春秋左氏传》。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公元836—840年）又有了《书》、《易》、《诗》、《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儒家经典。

简策制度

在青铜器的书和石头的书出现之前，起码是在青铜器的书出

现的同时，商朝末年，便出现了竹木的书。竹木的书，就是把字写在竹片和木板上。这种书到了战国时代已被普遍采用。这是随着社会的进程，奴隶制的逐步崩溃，历史处于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也就形成了著书立说的风气。因为文字和记事的方法不断普及，也就出现了比青铜书、石书更方便，更便于取材的材料。

通常所用的“罄竹难书”和“入木三分”的成语，就是从竹木的书起源的。所谓“罄竹难书”，意思就是把所有的竹子做成竹片，把所有的竹片都写上字，也难写完、算清坏人的罪行。所谓“入木三分”，传说大书法家王羲之写在木板上的字，墨迹透入木板足有三分之深，说明王羲之有功力。后来人们便用“入木三分”来形容刻画形象、说明问题的逼真和深刻。

竹木，是我国最早成书的材料。汉代学者王充在他的《论衡·量知篇》中说：“……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木为牍，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所以，当年人们将竹片做成的书，称做“简策”；将木板做的书，称做“版牍”。或统称书为“典籍”、“典册”、“简编”、“方策”。

竹木的书，始于商朝后半叶，一直到周朝以至战国、东汉，前后经历了一千六百多年。

竹简是怎样制成的呢？那是把竹子截成一定长度的竹筒，再把竹筒劈开成宽窄相等的竹签，然后再把这些竹签放在火上烤一下。因为新竹子本身含有一定的水分。有水分的竹签，写字会渗墨，竹签又容易变型，还容易腐烂、虫蛀。这种烤一下的办法，叫做“汗青”，也叫“杀青”。经“汗青”的竹签，就称做竹简。这种制竹简的“汗青”法，慢慢的就成了“竹书”和“史册”的代称。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里的“汗青”就指史册。制成竹简写上文章内容，再上下两道将其一片片用较牢的绳子连结起来，就成了竹书，这种竹书，统称简策。这样的一捆竹书，叫一册书，

古时也称一策书。往往一部长篇著作要有好几册(策)。上面讲的连结竹简的上下两条绳子，如用的是麻绳，叫做“编”。如用带色的丝绳，叫做“丝编”。有的用牛皮做的绳子，叫做“韦编”。

这种简策，在编排的时候，起首的第一片简的正面一般不写字，背面写篇名；第二片简的正面也不写字，背面写有该书的篇目。它们相当于现代书的封面和目录。第一片简叫做策简。编好的简策是从左向右卷的，以便于阅读，因为写简策是从右往左写起的，看也是从右往左看。这样打开便是篇名。再就是策简在外，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简策是部巨著，篇名的后面空几个字，再写上全书的总名。篇名称“小题”，书名称“大题”。简策题写书名的习惯与现在相反。现在是先写书名，后写篇名，那时却是先写篇名后写书名。主要因为那时的竹木书每片字数容量小，一部书往往要用几百片甚至数千片竹木，一篇文章常常要编成几策，先写书名后写篇名，就很难查寻了。现今的书，纸页字数容量大，数十万字的巨著，一般只有一册，一个总书名便可囊括，篇目在后一目了然。

一策策从左向右卷起的竹的书，有的用帛织物包起来，这种包装物叫做“帙”；有的用口袋之类的东西包装，叫做“囊”。

木书——版牍，据记载，主要是用于官府的文书、布告、通信、名册、地图、画图等。版牍用于登记名录或户口的，叫“籍”或“簿”。古时候通信，是写在木版上，再用一木版将其盖上，写清收信人的地址、姓名，然后用绳子之类的东西捆好，在捆绑处加上粘土，粘土上再印上阴文的印章，犹如现今的铅封，不过这种盖有阴文印章的粘土，叫做“封泥”。由于这种通信用的木版一般都是尺长，故而称做“尺牍”。目前还有些地方把书信称做“尺牍”，有些有关“如何写信”的书称做“尺牍读本”。因为版牍古时候通常是用来书写公文和信件的，所以后世便把文书、档案等工作泛称“文牍”。后来又加以引申，把那些“文山”、“会海”，靠脱

离实际的公文旅行的方法来指导工作的官僚主义作风，称做“文牍主义”。形容那些内容重复、冗长的文章的“连篇累牍”的成语，也出于“版牍”一语。

因为木版的幅度比竹简宽，所以也常用来画图。地图也是画在木版上，故至今还称一个国家的领土地界为“版图”。

竹木的书，份量重，携带不便，不易收藏，更不便阅读。最令人担忧的是，一旦编断了，简策的次序便混乱了，而且那时的简策不都写有序号，要把错乱的简按顺序理顺，是十分麻烦的事。

这是从编带容易断裂的角度看，从简策翻阅得多甚至把韦编磨断的角度来说，则表明治学刻苦。所谓“韦编三绝”的出典，就是这个意思。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谓文质兼备）矣。’意思是讲孔子读《易经》，皮条多次断绝。后遂用“韦编三绝”、“三绝韦编”、“易书三绝”、“绝韦编”、“韦编屡绝”、“绝编”等，来形容发奋读书、刻苦治学。

正因为绳编容易断裂，故古人很注重校讎工作，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校勘。校勘工作是古籍整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简策制度在我国盛行的一千六百多年间，简策的书很多。光孔子编定的就有六部之多。即《诗经》、《书经》、《仪礼》、《乐经》、《春秋》、《周易》。孔子以后，又出现了很多思想家和很多名著。这些名著称做“子”书，如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墨子、韩非子等。这个时期还有伟大的诗人屈原和他的名著《离骚》、《九歌》、《天问》。东汉王充的哲学著作《论衡》，楚人甘德、魏人石申合写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论著。西汉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其中有246个应用题和各题的解法。

两汉时代还有不少名著。西汉初年，萧何定律令，张苍定章程，韩信定兵法，叔通定朝仪；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

刘安的《淮南子》、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杨雄的《法言》、《太玄经》，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枚乘、东方朔的辞赋。东汉还有班固的《汉书》、许慎的《说文解字》、张仲景的《伤寒论》、张衡的“浑天学说”、王符、应劭、崔实、徐干、仲长统的政论和王粲、刘桢等“建安七子”的诗歌，都在我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两汉文化的卓著成就，是值得研究的。

简策书籍在我国历史上，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极为重要的手段。

但是由于竹木的书不方便处很多，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间，简策还相当盛行的时候，就出现了帛书。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墨子》中，有这样的记载：“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可见当时是竹木书和帛书兼而有之。

帛书

帛书，就是把著作写在丝织物上的书。当时的织物一般有帛、素、缯、缣等。写在帛上的称帛书，写在素上的为“素书”。到了西汉，帛书渐多但还未普及，东汉时期才开始盛行。当时有专门用来写帛书的缣帛，上面有黑或红的界行，就像现代稿纸的格子线一样。这种界行，红的称为“朱丝栏”、黑的称为“黑丝栏”。

帛书的流行时间不算长，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年到公元三百年之间，前后只有六七百年光景。

1942年，在长沙市东郊子弹库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帛书，丝绢上有书有画，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帛书，价值极为珍贵。可惜原物被美国人柯强盗骗去了，现存美国纽约。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一幅帛画，画有一龙一凤，线条流畅，色彩明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帛画。

七十年代，在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西汉早期长沙丞相轪侯家族

的一、二、三号墓葬中，发现了空前丰富的、十分珍贵的简册、帛书。其中，竹简总计922支，共九千余字。医书简最长的29.8厘米，每简30字左右，最短的22.4厘米，每简25字左右。帛书有《老子》、《战国纵横家书》、《周易》、《左传》、《五十二病方》、《相马经》等二十多种书册，共十二万余字。字体有篆、隶书和篆隶之间的秦隶，或称古隶。从其书写风格的明显不同，可见其抄写年代的不同。如《五十二病方》，字体远不同于秦统一中国后的标准小篆，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老子》甲本，字体为秦篆，系汉高祖称帝（公元前206年）以前的抄本。《战国纵横家书》为篆体，比《老子》甲本字体朴厚古拙，其抄写年代当略早于《老子》甲本。简牍《医书》，字体为隶书，其抄写年代约为《老子》甲本同时或更早一些。

这批帛书的形式分折叠、卷轴两种。折叠形的大都写在高48厘米的整幅帛上，有极细的朱丝栏，很像绵连的简册，每行六七十字。一幅帛上抄有几种书，对折为双幅，再折为四幅、八幅，大都折叠存放在一个漆盒内。卷轴形的高24厘米，卷在一块长条形木板上，多属半幅帛，每行三十余字；帛上抄有好几种书的，每种书的起首一行涂一墨钉作为标识。两种帛书的尺度和字数，与汉代书籍用竹简的尺度和字数大体相当，可以看出帛书是由竹简书演化而来。据东汉应劭的《风俗通》载：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定刊，可缮者以上素也。”

由于当时将一卷帛书称为一“卷”。这个“卷”字就成了书的数量单位，一直沿用到现在。现在人们仍称书为卷，如“该书为五卷本”，“这本书是第二卷”等。

由于丝织的帛书价格贵，除了官府或有钱人，一般人用不起，所以就是到了东汉帛书流行的时期，也没有完全代替简策。